

诸多制度突破

修订后的未保法呵护“少年的你”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体系、压实家庭和国家监护责任、增设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侵害后的强制报告制度、创设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制度、强化法律责任……10月17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高票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将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表示,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补齐了现有法律中的短板,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本次修改,对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了大幅修改和完善,新增“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两章,由7章扩展为9章,条文由72条增加到132条,修改几乎涉及原法的每一个条文。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初步担负起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小宪法”的使命。

首次明确协调机制

总则新增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的具体工作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承担。

郭林茂表示,关于未成年人保

护协调机制具体工作的承担部门,在审议修改过程中存在一定争议。作出上述规定的主要考虑有:在法律中明确提出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进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相关职责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单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责任不清,严重影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效,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从工作力度和有效性考虑,法律明确了应当由政府承担协调机制具体工作。

协调机制具体工作原则上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承担。民政部门在发挥国家的兜底责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具备较好的工作基础,从国务院到县级人民政府,上下统一均由民政部门承担现实可行,也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兼顾地区间的差异性,给予地方一定的灵活性。实践中,有地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议事机构设在教育等部门,取得了良好成效。

建立违法人员查询制度

佟丽华表示,在学校以及教育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更为隐蔽。很多此类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往往都是因为偶发因素或者情节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为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

少这类伤害,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政府保护”一章中规定:“国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

与本条相对应,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录用查询以及每年定期查询两项具体制度,发现应聘者、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不录用、及时解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等,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为了预防和减少发生在学校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的工作制度。在“社会保护”一章专门增加规定禁止“性骚扰”,在禁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有关未成年人的淫秽色情物品和网络信息基础上,特别增加禁止“持有”。

佟丽华介绍,在一些国家,持有、浏览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色情制品将构成犯罪,我国原来对此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修改后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持有”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色情制品,尽管只增加两个字,但这是个重大变化,应当引起社会关注。

创新网络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单设一章,佟丽华认为,此举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治基础。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要形成合力,培养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

如何防止网络沉迷是当前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虽然国家新闻出版署专门发布了《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但在法律制度层面缺乏具体规定。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8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教育、卫生健康、新闻出版、文化旅游、网信等政府部门的具体责任;对容易导致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内容作出了规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所有网络服务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时,要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明确了网



络游戏要经过特殊批准的制度;为了综合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及保护其隐私权,明确规定了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这个系统是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创设的一项重大制度,明确规定了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管理;对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作出了特别规定;明确规定了学校的教育和引导功能。

社会上对未成年人能否参与网络直播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此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时,应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据《中国青年报》)

6家基金会 10亿元互联网筹款 催生德勤“公益小勤人”

互联网筹款给公益机构带来很大便利,筹款数量剧增。但因为互联网筹款工作的碎片化特性,给公益机构,尤其是财务增加了大量工作。而由于互联网上的小额捐款数量巨大,单凭人工去核算,难免出现失误。

针对这种情况,德勤公益基金会和德勤数字化团队携手,推出“公益小勤人”,将德勤率先推出的智能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解决方案,应用到公益领域,用企业级数字化解决方案,助力公益机构透明度提升和公益行业发展。

庞大工作量: 几十万笔捐赠

对于互联网筹款带来的巨大工作量,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伏虎深有体会。王伏虎举了支付宝“公益宝贝”的例子,公益宝贝是“支付宝联合很多商家,让商家在每一笔的销售里拿出几分钱来捐赠”。

基金会需要从支付宝后台下载一个表格,每天汇总前一天全部的捐赠,但往往“公益宝贝”的表非常庞大,“有时候一个表就是几十兆,里面几十万笔捐赠,全是几分钱”。王伏虎说,在面对这种繁琐的捐赠,往往做账

就会相对滞后,不能当天就把前一天的账给计算出来。

而在筹款比较集中,比如说99公益日时,几天之内就有大量筹款进来,这对基金会也是很大的挑战。而且筹完款之后,马上就要拨款,要迅速把钱算清楚。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财务就是整天不断地算账”。

今年99公益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六七百个项目,所以工作量非常大。财务每天下载报表,然后再去做数据的分类汇总,“需要一个人多半天时间去完成,这个时间就全耗掉在这了”。王伏虎说,基金会一共财务5个人,每天要完成这么多工作量。现在民政部认定的筹款平台还在增加,基金会不同平台上都会有这样的捐赠数据过来,这对于财务压力特别大。“所以把财务从他/她一天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晨霞也有同样体会。2018年“公益宝贝”的项目规模是3000万元,基金会当时安排了一个项目专员,每周五从下午开始下载账单,然后就做分账,做完以后再去跟财务核对。

“所以我们其实就有一个专员耗在那边,每周五就要做这个

事。”何晨霞说,虽然基金会后来也自己定制了一个财务分销系统,但是成本非常高。

德勤解决方案: 小勤人出马

面对公益机构所遇到的困难,德勤公益基金会从公益行业特点出发,设计出“主要是解决公益组织财务问题”的“公益小勤人”的解决方案。

德勤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拓轩认为,公益机构传统的手工分账一个是耗费人力,这些专业公益人士时间被占用,也不能去做更重要的事情;第二是这些账分出来其实会有误差。很多数据的准确性,以及这些数据怎么用,也不一定用得好。德勤一是对财务熟悉,二是对技术熟悉,所以审计团队和税务团队几个同事就开发了这样一套RPA系统,叫“小勤人”,实际上它不是机器人,它是电脑里头的一套软件。

王拓轩进一步介绍,这套软件可以去帮助企业的捐款做分账,但是小勤人的好处是,它是一套程序,可以24小时工作,效率也比较高;第二个是准确性好,是程序操作。分完账之后,这些账的信息还能被利用起来,比方说统计来

自于不同渠道、不同项目、不同时间段的捐款的数额的变化趋势等,给公益组织的管理人员做决策上的支撑和支持。另外,也会给这些组织管理或者财务捐款的透明性带来了很大的增值。

“小勤人本身也是我们服务客户的一个商业解决方案。”王拓轩说,德勤也是第一次把这种商业性解决方案带到公益领域。

继成功为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开展“募捐捐款平台自动化对账”志愿者项目后,德勤团队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海南成美公益基金会、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等6家国内知名基金会,以公益专业服务的方式开展合作。

希望公益组织 关注技术应用

有了“公益小勤人”的协助,王伏虎体会到了它所带来的便利性。“今年有了‘小勤人’的帮助,其实我们在财务这些方面完全没有问题了。”王伏虎说,因为有公募资质,所以基金会和很多社会组织有合作,不管是在腾讯公益,还是在支付宝公益,都有很多零散公益的小项目。“所

以这些项目要单凭人工去知道每一笔钱核对后是哪个项目的,然后把项目结算处账目,财务真的是压力非常巨大的。”

另外,“公益小勤人”也有力地支持了基金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王伏虎认为,基金会数据统计的时效和精准度这两个维度在技术的帮助下肯定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能够及时、精准地反馈给捐赠人基金会的每个项目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对我们的透明度,公信力是有帮助的”。

小勤人处理这些数据,准确率就是百分之百。王拓轩表示,通过“公益小勤人”,希望引起更多公益组织去关注技术的应用。通过技术应用,可以帮助它们改变很多事情,比如机构的透明度和提升机构的效率等。

“未来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公益组织。”但是王拓轩也强调,德勤基金会成本和团队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服务全国所有公益组织。但是公益组织也可以通过这些作为借鉴,寻找合适的其他技术途径。“德勤更多的是做一个技术的倡导者。”

据王拓轩透露,为了服务好这6家每年共计超过10亿元的互联网募捐善款,德勤已经投入105万元人工为主的成本。(徐辉)